

“鲁学”解

跃进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鲁学”的产生与鲁地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就其字面意义言,“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鲁地。其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同样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其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秦汉之际,“鲁学”与“齐学”在经学内涵方面殊途同归,而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两地学问逐渐分化,“鲁学”开始从单一经学向文学方面演变,孔融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鲁学;齐鲁;孔臧;孔安国;鲁诗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08)01-0005-06

《史记·货殖列传》称:“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1]当然,齐、鲁的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屡有变化,犬牙交错,但大致是以今天的泰山为界,山东半岛的南部为鲁,“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2](《地理志》)。东北部为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3](《齐策》)。从地域上说,战国、秦汉时期的齐、鲁故地,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山东半岛,而是北接燕、赵,南届江、淮,疆域还是很辽阔的。

从学术文化发展角度看,秦汉时期儒学的兴起,即由齐、鲁文人发起,并逐渐推广全国。兰陵人王臧曾从鲁学大师申公学习《诗》,在武帝即位之初就推荐申公,武帝派使者用蒲裹轮,驾驷马远迎八十余岁的申公。建元元年(前140),王臧与丞相卫绾等奏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与赵绾等以文学为公卿,议设明堂,以朝诸侯;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由于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此事未就,但是揭开了两汉经学序幕,影响极为久远。此后,两汉经学大师,大多出于齐、鲁,其核心地区曲阜和临淄自不必说,周边地区如东海和琅琊也出现了很多经学大师,这在《汉书·儒林传》中有详细的述论。

从文化传统上说,这里是儒学的发源地,故历来齐鲁并称,乃就其大处而言^①。不过,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文化实质颇有不同。因此,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期,齐与鲁在当时士人心中往往颇有差异。《国语》就分设《鲁语》和《齐语》,齐、鲁本来就是两个诸侯国。区域地理、文化传统各有传承。姜太公始封于齐,都营丘(今淄博地区),“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1](《齐太公世家》),对于传统的东夷文化多所保留。周公旦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因辅佐成王未便脱身,而派其子伯禽代行其政,“变其俗,革其礼”^[1](《鲁周公世家》),即用周文化改造当地文化。根据传统的看法,山东曲阜原本是商民的发源地,与西周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但是由于周公的影响,鲁地反而保存了更多的周文化的传统。故《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见《易象》、《鲁春秋》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史记·货殖列传》也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龃龉,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嗇,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一生就是以周公为楷模

收稿日期: 2007-08-30

作者简介: 跃进(1958-),男,吉林白城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秦文化等。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制礼作乐，处心积虑地恢复周公创立的政治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在谈及鲁地风俗时这样写道：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孔子闻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嗇爱财，趋商贾，好誉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2〕

对于齐、鲁文化同源而异流的分析，向来是先秦两汉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的成果也异常丰富^①，这里似无展开赘述的必要。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秦汉统一以后，齐、鲁文化在趋同融合之余，是如何保持其固有的风俗习惯、思维心理以及方言土语等方面的差异。譬如《汉书·儒林传》载伏胜传授《尚书》时说：“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颜师古注：“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2〕可见齐言与颍川等地的语言相差较远。而鲁地方言则与豫州方言有所接近，如扬雄《方言》往往将齐语称为“东齐海岱之间”，而鲁语则称“宋鲁陈卫之间”。至于文化心理上更是多所区别。因此，《后汉书·郡国志》将鲁归兖州，齐归青州，就是这个道理。

“鲁学”，就其字面意义言，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其内涵，《汉书·儒林传》有所涉及：“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2〕这里所提到的“鲁学”，是与“齐学”并称的概念，都围绕着《春秋》而展开：《穀梁春秋》是鲁学的代表，而《公

羊春秋》则是齐学的代表。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以鲁周公之国，黎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2〕（《艺文志》）。也就是说，因解说不同而有“鲁学”与“齐学”的分别。《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为齐人所作。这里暂且不论。《左氏传》传为鲁太史左丘明所作，《穀梁传》为鲁人穀梁子所作，均属于鲁学范畴^②。不仅《春秋》传统的看法，六经均与孔子恢复周礼有关。因此，齐、鲁之学的本质就是经学，只是传授系统不同而已。就大处而言，鲁学往往更加注重经学的本旨，而齐学则擅长于对经学的阐释。明显的例子就是《易》学。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记载，《易》学虽说是孔子最看重的一部经典，相传“十翼”之撰就出自孔子之手，但秦汉以下《易》学家多齐人。而《古文尚书》的传授则以鲁学为重。《尚书》经秦火久有亡佚，而济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这就是所谓的《今文尚书》主要是齐学。武帝末，鲁共王扩建孔子旧宅，“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对校伏生《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由此，齐、鲁《尚书》之学，遂在两汉分为今文、古文两派，齐尚今文，而鲁习古文。《孝经》、《论语》、《礼记》也出自孔壁，《汉书·艺文志》著录作《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安昌侯张禹有《安昌侯说》一篇。古《论语》凡二十一篇，其后有《鲁论语》二十篇，传十九篇。西汉学者龚奋、夏侯胜（有《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韦贤、扶卿、萧望之、张禹（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王骏（有《鲁王骏说》二十篇）等亦传习《鲁论语》。礼学方面，鲁地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地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徐襄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徐延颇能通经。二人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因此，凡言礼为颂皆出徐氏。当然，“鲁学”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诗”，汉初为申培公传授训故，有《鲁故》二十五卷，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集有《鲁说》二十八卷。特别是韦孟、韦贤、韦玄成三代《鲁诗》世家。不仅传授

① 如，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山东孔子学会编《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李伯齐《山东文学史论》（齐鲁书社，2003年）等。

② 当然传授者并不仅仅限于鲁人，如虞卿、荀子、张苍、贾谊皆非鲁人。

经义,韦孟、韦玄成还模仿《诗经》创作《讽谏诗》、《在邹诗》及《自劾诗》等。《讽谏诗》收入《文选》历来传诵。《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4]韦贤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玄成以《诗》授哀帝,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此鲁诗韦氏学一时成为显学。东汉《武荣碑》记载“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碑文记载汉桓帝之死,则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据此而知,韦氏章句在东汉末叶依然流行。韦氏一家以经学发迹,正好验证了邹、鲁的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与“鲁学”研究有重要关系的著作还有《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家语》,颜师古判定“非今所有《家语》”。这里所说的“今所有”只是就唐代流传的本子而言,是否为现在所传本,尚待考订。但不管怎么说,《孔子家语》确为当时一部重要的鲁学著作,只是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若干变异。相传孔鲋所著《孔丛子》也应属于鲁学的范畴。当然,其作者及年代,目前尚有较大的争论。该书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宋代嘉祐中宋咸为之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疑该书为颜师古所未见。朱熹《朱子语类》、宋濂《诸子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并指斥为注者宋咸所伪造。罗根泽《孔丛子探源》以为《隋书·经籍志》和宋咸序均不可信,因为,第一,刘向、班固均未提及,汉人从未征引。第二,记述孔氏行实颇多错谬。第三,《独治篇》多以第三者的语气论及孔鲋,不像是自述之词。第四,《答问篇》自称“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陈,将没,戒其弟襄曰”云云,作者质疑:“易箦危急之际,还能操觚著书吗?所以我们知道明明是后人伪作的。”罗先生认为该书的编纂的年代是在曹魏时代,可能与王肃有关,因为这部书始见于王肃《圣证论》论及^[5]。不过,这种质疑也并未成为定论。《资治通鉴》卷七《秦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下焚书令时,“魏人陈馥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胡三省注:“孔鲋,孔子八世孙,字子鱼。鲋,音附。”^[6]这条材料告诉我们,孔鲋曾有藏书之举。《孔丛子》的内容比较庞杂,或辑自藏书,也未可知。类似的例子,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很多材料辑自先秦古籍而加以适当的修订编排,而作者则署名刘向。《战国策》本为刘向所编辑,《册府元龟》在著录该书时就径直称作者为刘向。《孔丛子》似乎也是这样一部汇总众

家之说的杂钞类著作,而主要汇总的是鲁地的著述传说。

从上述简单的勾勒中,我们虽然还不能回答“鲁学”是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鲁学的特点和范围:

第一,鲁学发源地虽在鲁地,而鲁学家并不一定局限于鲁地。孔子弟子多仕宦鲁地,但也有如子夏这样的弟子,北逾黄河,为魏文侯师。而子羽甚至南渡淮河,远至长江流域等。今天从楚国故地所发现的楚简,如郭店简,就有很多儒家经典。专家认为就是孔子七十弟子所传授,远至大江南北。但是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还是以鲁地为主。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七十弟子中国籍可考者,鲁国三十五人,占三分之二。卫、齐各五人,陈、宋、楚、吴各一二人。这些地域也与鲁地相去不远。当然还有两个秦国弟子。至于其再传弟子中,鲁国依然居多数,而孟子、荀子则游历范围更广^[7]。至战国后期,由于齐国尊崇稷下文士,儒学在此格外昌盛起来。此后,言儒学则齐、鲁并称。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它俗”。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多传“鲁学”,如萧望之,东海人兰陵人,张禹,河内轵人。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

第二,鲁学的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儒家类五十三种著述来看,儒家的范围更为广泛。根据《汉书·地理志》如西汉丞相 46人,依其籍贯或出生地统计,属于齐鲁地区就有 36人^[8]。其中,出较多的是沛、邹鲁、东海及河内诸郡。这正印证了《汉书·赵充国传》所载“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班固对于儒的解说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由此可见,鲁学的含义,其实更包括古代的典章文献。如《庄子·天下》所说:“其在于《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对此,章太炎《国故论衡》有详尽的论述。

第三,西汉前期,曲阜依然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汉书·儒林传》载:“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著有《汉

仪》十二篇，亦大抵因秦旧制。东汉时期的曹褒曾修订叔孙通《汉仪》，但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颇不以为然，认为曹褒改编汉礼多乖成典：“曹褒撰讖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4]所谓成典，即六国、秦汉交替时期的典礼。《论衡·效力篇》：“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我们从文献记载中知道，叔孙通号称以儒家礼仪辅佐高祖，而在某些方面又注意吸收秦、楚等地的文化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譬如《史记》本传记载：“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陈直《汉书新证》：“楚人喜着短衣，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所出竹简第一简云：‘一新智纁，一楚智纁，皆有蔓足纁。’足为促字省文，译以今言，为‘一件新制厚衣，一件楚制形式厚衣，皆用缁做成既短且厚之衣。’叔孙通因高祖喜楚歌楚舞，故改服楚制短衣，所以趋时尚也。”《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其《上封事》云：“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2]这句话的意思，如果鲁国君主和秦始皇重用孔子和叔孙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变乱。该传又载刘歆云：“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由此可见，西汉文人学者对于叔孙通之敬重，可谓无以复加。这是因为，以叔孙通等为代表的鲁学奠定了西汉礼乐制度基础。唯其如此，王先谦编《诗三家义集疏》凡是汉初《诗》说，均归之于鲁学。这样做，虽不免胶柱鼓瑟之讥^①，但是认为“鲁诗”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其观点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

—

问题是，“鲁诗”的传授，在汉初并不在曲阜，而是在楚王刘交所封之地，即今天的徐州。《汉书·高祖纪》载六年“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文颖注：“薛郡，今鲁国是也。”《地理志》鲁国下云：“故秦薛郡。”则楚王刘交所辖范围本来就包括鲁地，唯治所在徐州。这里原本是刘邦的老家，亦为故夏旧地。《左传·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从现在的方言俗语及生活习性来看，这个地区与鲁南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根据李白凤先生的研究，商人的祖先少昊氏发迹于鲁南曲阜地区。后来经过成汤的八迁，逐渐迁徙到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商人在扩张的

过程中，逐渐排挤徐人，后来索性称之为徐夷。从青铜器制作来看，商民好饮酒，徐人则喜音乐，看来两者原本就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氏族部落的演进看，徐人的文化传统与楚地的关系往往更加接近^[9]。但是，就《诗经》传授而言，这里则完全以《鲁诗》为主，因此，徐地也与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秦汉时期如此。根据《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刘交本是刘邦的少弟，年幼时即与鲁穆生、白生、申公等从荀子弟子浮丘伯研习《诗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各自散去。汉六年（前206），既废楚王韩信，分其地为二国，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掌管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地，包括今天江苏北部的徐州、连云港及山东南部广大地区。封刘交为楚王，实际上就是委派刘交镇守家乡。刘交至彭城，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孝惠帝、吕后时期，荀子弟子浮丘伯在长安，刘交又派遣其子刘郢客与申公前往求学。文帝即位，听说申公说《诗》最精，诏为博士。由此，申公以《诗经》相传授，号称《鲁诗》。与此同时，刘交也传授《诗经》，号曰《元王诗》。《鲁诗》的传授，由此形成。

在文、景时代，道家、刑名之学号为显学，鲁学在这个时期受到一定的抑制。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论：“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说，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故当见抑矣。至于治《易》者，施、孟、梁丘皆出于田何；何齐人也。故诸家亦好言阴阳灾变，推之人事。惟费氏《易》较不言阴阳，较为纯谨。故汉之经学，自申公《鲁诗》、《穀梁》而外，惟高堂生传《礼》亦鲁学。其他如伏生《尚书》如《齐》、《韩诗》，如《公羊春秋》及诸家言《易》大抵皆出齐学，莫勿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事，所谓‘通经致用’是也。汉人通经本以致用，所谓‘以儒术缘饰吏事’，而其议论则率本于阴阳及《春秋》。阴阳据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争，一引古以争。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自伸其说，非此亦不足以居高而自安。”^[10]（P222）但是这种情形到了武帝即位之后，特别其独揽大权的元光元年之后发生了重要变化。《汉书·儒林传》记载，窦太后死后，武安侯田蚡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广泛延揽文学儒者。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向风而靡。在此背景下，齐人公孙弘与鲁国学者孔臧联名奏请曰：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① 拙稿《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对此有所辨析，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

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2]（《儒林传》）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奏疏。武帝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倡导儒术文学，“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可以说，西汉儒学之兴，首倡于齐、鲁。至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则成倍增长。元帝好儒，凡能通一经者都可以免除徭赋。成帝末，大臣奏表，认为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太学弟子过少，于是增设弟子员三千人。而到东汉时期，太学增长更快，多时竟达数万人。当然，儒学也由此而分化。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云：“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徐彦疏云：“谓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武帝时代，儒者分为两类，即儒生与洪儒。前者仅仅恪守所谓家法、师法，专通一经，而后者则博览群书。两汉之际，儒者继续分化，故王充《论衡·超奇篇》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文人学者分为五等，即：俗人、儒生、通人^①、文人、鸿儒。在王充心目中，鸿儒是最高的典范。但是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文人”风范则是退而求其次的追求。在王充心目中，真

正可以称得上是“文人”的，有谷永、唐林、司马迁、阳城衡、扬雄、桓谭等人，或奏议，或史学，或议论，均成一家之说，“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鸿儒”之后就是“文人”。两汉之际学术风气的变化，由此不难推想。

三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鲁学”也逐渐发生着质变。与公孙弘联名上疏的孔臧，向“以经学为家”，曾辞御史大夫而乞为太常^②，“专修家业”。《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儒家著录“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很可能属于“议论”方面内容。但是与此同时，在诗赋类又著录“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这很可能就超出了“家业”的范围，而具有了文人的色彩。不仅创作辞赋，孔臧书信亦为时人所重。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载：“《孔丛·连丛子》云：臧历位九卿，迁御史大夫，辞曰：‘世以经学为家，乞为太常，与安国纪纲古训。’遂拜太常，礼赐如三公，著书十篇。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中，似其幼时之作也。又为书与从弟及戒子，皆有义。”按照王应麟所说，他所见到的孔臧凡二十四篇，其中见于别集者二十篇，或者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二十篇。另有四篇“幼时之作”未见别集收录。今本《孔丛子》收录有孔臧《谏格虎赋》、《杨柳赋》、《鸱赋》、《蓼虫赋》等四篇，是否就是别集之外的四篇，现已不得详考。值得注意的是，从体制上看，这四篇均为小赋，其中，《鸱赋》以本贾谊《鵩鸟赋》而来，属于抒情小赋一类。前面曾说到，叔孙通借用楚国风尚改造旧制，在文风方面，孔臧也充分吸收楚风而创作辞赋。因为《鵩鸟赋》是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所作，融入了很多具有南方色彩的老庄思想。尽管这些作品的真伪尚有争议，但是从一个侧面看出，武帝之后的“鲁学”大家已经开始有向“文人”转变的苗头。《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常《孔臧集》二卷就是明证。即便是一代经学宗师孔安国，尽管没有别集传世，其所作《尚书序》则被作为“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的范文而收进《昭明文选》。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更标志着“鲁学”转变的完成。魏文帝曹丕深好孔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曾募天

① 按照徐幹《中论·治学》所说，儒生也有分别，他认为：“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通人，应劭《风俗通义》作“通儒”：“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翫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

② 太常一职主要掌管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事宜。

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也著录《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今存诗五首，文三十九篇，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如果说，西汉主要是“齐学”天下的话，东汉时期的“鲁学”在与“齐学”的比较竞争中则已逐渐占据上风。这固然与今文经学走向式微、古文经学逐渐兴起有关，根据《汉书·宣帝纪》、《汉书·楚元王传》、《儒林传》等文献记载，甘露三年（前51）宣帝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沛人蔡千秋为郎，尝从鲁荣广受《穀梁》。宣帝召见蔡千秋，让他对比《公羊》与《穀梁》说，蔡千秋更倾心于后者。因此，蔡千秋除为谏大夫、给事中。由此不难推想宣帝的学术旨趣。与此同时，韦贤、夏侯胜、史高等鲁学大师，力主《穀梁春秋》。从此，确立大小夏侯《尚书》及穀梁《春秋》博士。说明到了西汉后期，以《穀梁传》为中心的“鲁学”已经与以《公羊学》为核心的“齐学”并列而为当时官方认可的显学。

不仅如此，鲁学还能够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扩大教学范围，将“鲁学”推向全国，为其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西汉末年，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东汉建国之初的建武五年十月，刘秀巡视沛县等地后，转至鲁地，派大司空祠孔子。这次寻访的重要成果就是初起太学，上继武帝增设博士子弟。《后汉书·儒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大小戴，

《春秋》有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笱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1]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开国皇帝，刘邦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是创立军功的武夫，而刘秀则多启用儒者。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所分析，他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从此，“鲁学”已走出相对封闭的经学范围，一跃而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一大批研习“鲁学”的文人学者得到重用。这就再一次印证了前引《汉书·韦贤传》所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七年又大兴土木，全面修缮太学堂，广延太学生。到了东汉后期，太学生与当时所谓的“清流”相结合，构成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对于东汉后期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4]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古史辨. 第四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7] 严耕望. 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A].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杨兆贵. 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A]. 中华文史论丛, 第57辑[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9] 李白凤. 东夷杂考[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 [10] 钱穆. 两汉博士家法考[A].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责任编辑: 李观澜

Studying the Lu's Learnings

Liu Yue-jin

(The Literary Department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ing of Lu's learnings relates to its culture. After describ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Lu's culture, we compa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etween Lu and Qi at the turning of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then we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u's learnings, from unitary Confucian classics to literature—from the end of Pre-Ha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Han Dynasty.

Key words: Lu's learnings; Qi and Lu Kingdom; Kong Zang; Kong An-guo; the Poetry in Lu